《劝学》不是“学生优秀作文”

《论语》以《学而》开篇，《孟子》以《王何必曰利》为首，《荀子》以《劝学》为冠。《学而》谈的是学习方法，《王何必曰利》谈的是学习内容，《劝学》谈的是我们要学习。三篇文字，穷则返本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基础。虽然，三篇文字所论相去无多（都是学习），但风格却大相径庭。通常我们认为《劝学》是一篇议论文，人教版语文教材把它放在“说理性散文”单元，并把“学习议论艺术”作为单元目标。我觉得，这是有一定问题的。

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语录体，对话体，专题论文。语录体的代表就是《论语》，对话体的标杆则是《孟子》，专题论文的滥觞是《荀子》。虽然《荀子》勉强可以算作“专题论文集”，可是，它的内容与“标准议论文”是相差甚远的。斑马也是马，可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马是不大相同；鲸鱼也叫鱼，可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鱼根本就是两种生物；一类事物中的“典型事物”与“非典型事物”有时候差别可能是很大的。

先秦时期压根没有文学的观念，春秋战国时期所说的“文学”原是“书籍”的含义，后来演变为“学术”的含义，到汉代又转化为“文章”的含义，一直到魏晋（“文学觉醒的时代”）以前，都没有纯粹的文学观念，文体意识则更是淡薄。

但是，我们研究文学史不能不从先秦说起，所以只能勉强称那些文字为“文学作品”。先秦文学的特点是“文史哲不分，诗乐舞结合”（这话其实就有问题，既然“文史哲不分”，怎么能叫“文学”呢？为了便于称呼，只好如此）。文史哲尚且不分，就更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“记叙文”“说明文”“议论文”之别。我们有时为了便于称呼，将《荀子》归入说理性散文中，这与真实的历史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就像我们为了方便区分而称刘备建立的王朝为“蜀”，实际上人家只是称“汉”，不称“蜀汉”，更不称“蜀”。

通常引用这样模糊的称呼并不会出现误会，可是有时候就容易出问题。比如，有一道作文题，请你以刘备的口吻给曹操写一封信，如果你在信中称自己的国家为“蜀”，或称自己为“昭烈帝（‘昭烈’是刘备的谥号，死后才有谥号）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同样，我们勉强把《劝学》算在说理性散文中本是无奈之举，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一篇“标准的议论文”。王荣生先生就曾说，按照西方对论证的定义去解读《劝学（节选）》，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议论文。

王先生接着说到，如果将《劝学（节选）》中的比喻论证、对比论证当作教学重点，那代表教师根本没有把它“当作古代经典文化的文学水平来对待”，而是把这样的一篇经典文言文“降低到了学生优秀作文的水平”。其实，按照王先生的观点，《劝学（节选）》还算不上“学生优秀作文”，因为里面的论证并不经典，也不典型。

用一篇论证方法并不典型，乃至严格来说并不是议论文的文章，去教给学生所谓“议论的艺术”，这违反了加涅说的“接近原理”（接近原理：刺激情境必须与预期的反应同时呈现。根据接近原理，假如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掌握“议论艺术”，则给到学生的刺激情境应该是：老师采用经典议论文本讲述其中典型的议论技巧。）因此，我们不能以学习“议论的艺术”的视角去解读《劝学》，而只能像王先生说的，“按照古代文章的阅读方式来解读”。

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，生硬地套用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习中，这样做始终是圆凿方枘，龃牾不安。文言文教学不能缺失中国传统文化，教学着力点是研习“具有中国特色的”谋篇布局的章法、体会“具有中国特色的”炼字炼句的艺术，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反思。

参考文献：

1. 胡馨方 叶黎明《文言节选文<劝学>的教学问题分析》

2. 王荣生《阅读教学教什么》